

千佛山的禅宗世俗信仰

王继训

(山东经济学院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 在千佛山禅宗世俗信仰体系中,主要以兴国禅寺的建筑布局、殿堂像设与千佛崖石窟寺的弥勒、弥陀造像向世人宣传在现实世界之上存在着一个神通广大、威力无穷的佛、菩萨与极乐世界,同时告诫世人可以通过求拜佛、菩萨摆脱苦难,获取福祥,进而达到极乐世界。

关键词: 千佛山; 禅宗; 世俗; 信仰

中图分类号: K239.21; B94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3842(2011)01-0059-03

在山东,自古以来鲁地尚儒,齐地崇道,佛教传入中土后,难以浸润齐鲁之腹地,只能在鲁文化与齐文化的边缘处立足。而齐鲁文化的交界处便是济南,于是这里便成为佛教的福地洞天,并出现了名刹、古寺、佛塔、佛山。佛教定制规定,修建寺庙要在远离尘世的山中。这种精心选址,利于割断尘缘,与尘无染,然后成道。所以,我们有理由推断,前秦皇始元年(351),僧朗来到济南,相中千佛山这处风水宝地,遂定居于此,与达摩东来,一苇渡江,见嵩山秀丽,遂居而悟禅,慧理至杭,见飞来峰挺拔秀丽,颇似印度灵鹫峰,乃筑室而居,同理。关于此事,《魏书·释老志》也有记载“有沙门僧朗,与其徒隐于泰山之琨尔谷。帝遣使致书,以缙、素、旃罽、银钵为礼。今犹号曰朗公谷焉。”

在禅宗世俗信仰体系中,既有深奥的宗教哲学义理,也有通俗形象的对佛、菩萨崇拜信仰的造像内容。如果说前者是以独特的思辨方式来论证现实世界的虚幻不实,充满痛苦,劝解人们追求至

高圆满的精神境界,接受对应的修行方法与处世态度的话,那么后者则是以殿堂像设、石窟造像的形式向世人宣传在现实世界之上存在着神通广大、威力无穷的佛、菩萨与极乐世界,并告诫人们通过求拜佛、菩萨可以摆脱苦难,获取福祥。这两者实际上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1](P86-89)}而千佛山兴国禅寺的建筑布局、殿堂像设与千佛崖石窟寺弥勒、弥陀造像,正是后者世俗信仰的具体体现。

兴国禅寺旧名千佛寺,又名千祓寺,为千佛山禅宗世俗信仰的主体建筑。创建于隋开皇年间。杨坚代周后,到处兴建佛寺,表达自己感恩之情,除政治原因外,其个人原因不可忽视。西魏大统七年(541)六月十三日其母吕苦桃生杨坚于冯翊般若寺。传言杨坚诞生,有尼名智仙者护持之,故早信佛法。“因少时得尼智仙之养育,及即帝位,每谓群臣曰:我兴由佛法。命史臣王劭为尼作传。其潜龙所经四十五州,皆同为大兴国寺。”^{[2](《舍利感应记》P1-2)}可见这时期天下寺院多以

收稿日期:2010-11-03

作者简介:王继训(1971-),男,山东临沂人,教授,文学、史学博士后,博士生导师,主任,主要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

基金项目:济南市2010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千佛山禅宗现状调查及保护开发对策研究”(10CLD47)的成果之一

“兴国”命名。此外,其母亲是济南历城人,为了纪念母亲,杨坚在济南地区大兴佛事。传说杨坚做了皇帝后,曾感梦找到了自己的外家,后果然在济南找到了自己的舅舅等亲戚。由此我们推断,济南兴国寺即是隋初兴佛高潮的产物,也是杨坚报恩故乡的体现。到唐贞观年间扩建,成为千佛山首刹。但隋兴国寺还不是禅宗寺院,至少到了唐中期以后才有这个称谓。宋时,兴国禅寺又加扩建。宋末明初,因连年战乱,禅寺“殿堂藜芜,无存一砖一瓦”。明成化四年(1468),由居士苏贤捐资重建,大雄宝殿、天王殿及僧堂、库房等全部予以重修,殿内重塑释迦牟尼、地藏王菩萨、十八罗汉、四大天王等像。清嘉庆到咸丰年间增修,又增建了观音殿等建筑。现存禅寺为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处禅宗寺院。禅寺依傍千佛山的走势,虽为东西走向,山门朝西。但禅寺主要建筑营造法则却完全符合禅宗的历史与传统。^①大雄宝殿在禅寺院东,坐东朝西,雄伟壮观。殿内正中莲花宝座上,供奉着世尊释迦牟尼塑像,两侧菩萨、罗汉侍立,左右侧分别为:普贤、文殊菩萨和阿难、迦叶等十大弟子。释迦牟尼像背后,南无观世音菩萨像站立,左右侍童子。玉佛殿在大雄宝殿北侧,殿中央佛龕内供世尊如来坐像。玉佛西侧佛龕内供奉地藏王菩萨。菩萨殿在大雄宝殿南侧,中央佛龕内供观世音菩萨,左右两侧分别为地藏菩萨、千手观音菩萨。禅寺中央有一座大殿,殿内弥勒佛像迎山门结跏趺坐,其背面韦驮菩萨站立。禅寺院西进门两侧钟鼓二楼矗立。北侧架有长廊,与长廊相对的是南侧的千佛崖石窟寺,窟内镌刻多尊隋唐佛像。石窟由西向东,依次为龙泉洞、极乐洞、黔娄洞等。

千佛崖石窟寺由9个石窟组成,大部分为隋开皇七年至二十年间(587—600)由刘景茂、李景崇、花仁、永照、杨文盖、吴□、宋叔□等人镌造的佛像。根据《历城县志正续合编》记载,现存千佛崖石窟造像材料,合计一十四条,有确切纪年的一十条,分别是女花仁造象题字(开皇十五年正月)、杨文盖造象记(开皇十三年九月)、宋僧海妻张公主造象记(开皇十三年四月)、大象主吴□造

象记(开皇十三年二月)、宋叔□造象记(开皇十一年五月)、女永照造象记(开皇十一年五月)开皇十一年五月十九日女永照为亡父母亡弟造弥勒像一区□女许兆兰为亡父母亡兄造□勒像一区上为国王帝主师僧父母有形之类咸同斯福、李景崇造象记(开皇十年八月)、九年四月等字残刻(开皇九年四月)、时昔造象记(开皇八年五月)、刘景茂造象记(开皇七年正月)大隋开皇七年岁次丁未正月十五日弟子刘景茂□身非桓疾踰露叶是以敬造弥勒象一躯□□皇□臣僚百官□七世师僧父母见在眷属□众生共同□□,等。^{[3] (P75-80)}可见绝大部分为隋开皇年间开凿,由此我们推断出当时佛教之盛。还有部分是唐贞观年间的造像。尚能辨出全貌的有一百三十余尊,镌刻精湛,是研究隋唐石刻艺术的重要史料。其造像主题无外乎是阿弥陀佛所主宰的西方三圣与弥勒佛。西方三圣中阿弥陀佛是表无量光明、寿命与功德。观音菩萨是表大慈悲。大势至菩萨是表众生喜舍。阿弥陀佛又称无量佛,弥勒佛又称未来佛,它们之所以成为济南地区最受欢迎的佛教形象,主要是抓住了众生之心,抓住了人们的理想追求,进而赢得了人们的信仰与崇拜。信奉阿弥陀佛可以长生不老,拥有无量寿命。信奉弥勒佛可以保证人间幸福。从长寿到延续人间的幸福生活,所以千佛山选择它们作为世俗信仰的主宰。极乐洞中有大小佛像八十七尊,正面石壁上刻有西方三圣,中间一尊为高三米的阿弥陀佛,盘膝禅坐,身后饰佛光,法相端庄。左右为大势至与观世音菩萨,侍立,高也近三米。三圣佛造像神态安详自如,雕工精细,线条优美,实为隋石刻中的精品。其他各窟,皆散落在洞外石壁上。有高居壁顶的,有举手可及的,有一二尊成窟的,有三五尊成窟的,参差错落。造像皆体态丰腴,栩栩如生,或身着锦衣,或手拈莲花,或凝神蹙眉,或结跏趺坐,或合掌禅定。龙泉洞内东侧与极乐洞相通。南侧石壁凿有多尊佛像,其中一尊弥勒像,为刘景茂于隋开皇七年(587)正月镌造,为千佛山年代最早的弥勒造像。禅寺院北有对华亭,建在高出禅寺10余米的峭壁间,原为僧人坐禅、讲法、皈依的法堂。

① 按照宋代以后禅寺“伽蓝七堂”制以及建筑营造法则,禅寺应该有佛殿、法堂、库房、山门、西净、浴室等。在中轴线上为主要建筑物,在其两侧为附属设施,布局对称,要求严格。主要建筑依次为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藏经阁。山门后是天王殿,中供大肚弥勒,背靠韦陀天尊。再后是大雄宝殿,供奉本尊——释迦牟尼,佛像两侧为迦叶尊者和阿难尊者。法堂是演说佛法、皈依集会之处。最后是藏经楼,是珍藏佛经的地方。大雄宝殿两旁为配殿:右为伽蓝殿,左为祖师殿。库房、西净、浴室等,分布四周。整个禅寺由多层院落组成,为僧人独特的宗教与生活区。

中国古代寺院建筑一般分依山式和平川式两类,与此相应的是,寺院布局也分石窟寺和塔庙两种。石窟寺大多模仿印度佛教的支提窟开凿,即窟正中有方形的塔柱或佛龕,以代表支提分位。不过有的窟是正中后靠壁前雕刻大佛,左右是菩萨、天王。有的窟前面若有多余空地,就再建寺院。^①千佛山兴国禅寺与千佛崖石窟寺,应该说是这类形制的比较典型代表。石窟寺的建凿以北朝至唐为盛,宋代以后每况愈下。北朝时王公大臣施舍私邸为佛寺成为一时的风尚,因为这些寺庙原系私人住宅,很少重新造塔,而以正厅供奉代替佛塔。所以一些早期佛寺其实就是许多与官署、私邸并无明显区别的院落。到南朝后期,汉式佛寺布局才基本定型,为中国传统世俗建筑的院落式格局,院落重室,回廊周匝,层层深入。宋代以后禅宗寺院独盛,禅寺均盛行“伽蓝七堂”制度,并在明代以后成为禅宗寺院建筑定式,殿堂像设也大抵一致。现在兴国禅寺的主体、格局、规模应该说是明清时期的产物。

弥陀信仰以《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和《往生论》为理论依据,宣扬信徒死后即往生阿弥陀西方净土。阿弥陀佛(梵文意为“无量寿”)所在的西方净土,没有苦,只有乐。怎么解脱现实苦难、往生净土呢?弥陀信仰在实践中提倡快速成佛法,认为只要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名号,死后便能往生净土。

弥勒信仰以《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弥勒下生经》、《弥勒大成佛经》为理论依据,为实现人间净土,以慈心为重,上生兜率净土,下生人间净土,发愿清净一切众生、国土,在人间成佛。弥勒佛有三十二相,身着黄金色,“慈心三昧”,故名“慈氏”,又名“阿逸多”(梵文意为“无能胜”),被世尊亲授记为“未来佛”赋有教化弟子之责。

弥勒信仰与弥陀信仰并不是水火不容的,弥

陀与弥勒信仰都主张净土,而且弥陀类经典也包含着弥勒因素,自古弥陀信仰者可兼修弥勒,“无论是传统的弥陀信仰,还是李唐伊始的白莲净土信仰,都有弥勒上生或下生的痕迹”^[4](《第三十五篇》P425)。早期禅宗反对简单化、程序化、形式化的念佛,但它并不反对念佛法门,也不拒绝灵活地念佛。所念之佛,亦包括弥勒、弥陀、阿闍等佛。所以,禅宗并不反对净土观念与弥勒、弥陀信仰。在现存的禅宗文献中,我们可以找到早期禅宗与弥勒信仰彼此关联的蛛丝马迹。“释迦如来传金桶袈裟,令摩诃迦叶在鸡足山,待弥勒世尊下生分付。今恶世时,学禅者众。我达摩祖师遂传袈裟,表其法正,令后学者有其禀承也。”^[5](《历代法宝记》P2075)透过迦叶传佛祖法衣于弥勒之说,我们有理由推断,这既是禅宗达摩祖师付法传衣遗风的体现,也是禅宗有意识地保留了与弥勒之间存在着某种承继关系的思想传统。

弥陀、弥勒信仰最早传入中土都在净土信仰中,只不过后来弥陀、弥勒信仰日趋衰微,唐中期以后为禅宗所接纳包容,自此弥陀、弥勒信仰有了新的信仰群体,弥陀、弥勒信仰自身也有了新的转化。

参考文献:

- [1]王继训.从元澄奏折看北魏佛教的传统与政策[J].理论学刊,2010,(9).
- [2]唐释道宣.广弘明集:第17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 [3]胡德琳.历城县志正续合编[M].济南:济南出版社,2007.
- [4]杨曾文.马祖道一与中国禅宗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 [5]大藏经:第51册[M].石家庄:河北省佛教协会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陈东霞

^①见周叔迦《法苑谈丛》第一章“寺院殿堂佛像释名”北京:图书出版社,1985年版。